

古
學
甄
微

責任編輯：黃小石

028

古學甄微

已 蜀 書 社 出 版

廣 元 南 河 印 製 廠 製 型 版
成 都 前 進 印 刷 廠 印 刷
四 川 省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一 九 八 七 年 七 月 第 一 版
二 九 八 七 年 七 月 第 一 次 印 刷

書 號：二二三九·一八

定 價：伍 元 貳 角 伍 分

出版說明

蒙文通先生（一八九四——一九六八），四川鹽亭人。我國現代傑出的歷史學家。從二十年代起即執教於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成都國學院、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河北女子師範學院。四十年代復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建國後，任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員、學術委員，並先後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員。

蒙文通先生在中國古代史及古代學術文化研究領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詣很深，成就甚高。他早年受業於清末國學大師廖平與劉師培，從研究傳統的經學開始了他漫長的學術生涯，後來又向近代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問佛學與古代學術思想，不斷拓寬研究天地，一生精進不已，終於成為博通經史、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清哲學的一代著名學者。

一九二七年，蒙文通先生撰成成名之作古史甄微，提出了中國上古民族可以江漢、海岱、河洛分爲三系，其部落、姓氏、居處地域皆各不同，其經濟文化各具特徵的學說。其後又以經學抉原一書，進一步從學術文化的角度豐富和完善了此說。「三系學說」和當時古史辨學派的觀

點迥異其趣，但就其對學術界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言，實可以與之媲美。

蒙文通先生最重要的史學思想是「通觀達識，明其流變」，認為歷史是發展變化的，史學家的任務，在於指出歷史變化的痕蹟，揭示發展的原因。在實踐上，蒙文通先生注重從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去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一文，就是「史以明變」觀點的代表作。

蒙文通先生晚年致力於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提出岷崑崙為上古一文化中心說，認為巴蜀文化當系自西東漸，楚文化也頗受巴蜀文化影響，山海經就是巴蜀楚上古文化產品的著名學術觀點。這裏，值得大書一筆的是，作為史學家，蒙文通先生懷着維護中華民族崇高利益的責任感，用他生命的最後四年時間，寫成了一部考論古代百越民族史的專著越史叢考，縝密地考證了大量的古文獻資料，引證翔實地批駁了國際上一些越史學家覬覦我國領土的種種奇談怪論。這是一部充溢着實實在在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書，它的成就標誌着我國古民族史研究的新水平。

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上述的古史甄微、經學抉原、越史叢考外，還有古地甄微、古族甄微、儒學五論、道書輯校十種、巴蜀古史論述、先秦少數民族研究等專著和學術論文數十篇。他在古代歷史、古代地理、古代民族、古代學術、古代宗教等很多領域都給後人留下了十分豐碩的成果。此外還有數十萬字遺稿尚待整理刊布。

蒙文通先生數十年未離講席，誨人不倦，循循善誘，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學術人材，可謂桃李

遍全國。爲了更好地保存與集中反映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成果，啓迪後學，我社決定分六卷編輯出版蒙文通文集。古學甄微爲本文集第一卷。這套文集將把蒙文通先生的主要學術著作全部收入。整理工作由蒙文通先生之子、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蒙默同志擔任。

巴蜀書社編輯部。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錄

周代學術發展論略	(一)
古史甄微自序	(十九)
略論 <u>山海經</u> 的寫作時代與產生地域	(三十五)
儒家哲學思想之發展	(六十七)
理學札記	(一〇三)
理學札記補遺	(一三五)
致張表方書	(一五五)
致鄺衡叔書	(一五九)
答洪廷彥	(一六一)
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	(一六五)
漆雕之儒考	(二〇三)
浮丘伯傳	(二〇九)

論墨學源流與儒墨匯合·····	(二一一)
儒家法夏法殷義·····	(二二九)
儒學五論題辭·····	(二三七)
楊朱學派考·····	(二四三)
略論黃老學·····	(二六九)
法家流變考·····	(二八五)
道教史瑣談·····	(三一五)
晚周道僊分三派考·····	(三三五)
校理老子成玄英疏敍錄(節錄)·····	(三四三)
坐忘論考·····	(三六一)
陳碧虛與陳搏學派·····	(三六九)
中國禪學考·····	(三八三)
唯識新羅學·····	(四〇一)

周代學術發展論略

在討論我國學術發展問題時，不少學者常用倉頡爲黃帝史、夏有太史令終古、殷有內史向摯，周禮·春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等，來說明我國史學起源之早。而究其實，這些官職雖名爲「史」，而其職司只不過後世祕書、書記、司書之類，^①故其所職掌者多是典、志、圖、法之屬，還不是後世的歷史編纂。學者又常用漢書·藝文志所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來說明我國歷史著作起源之早。而究其實，尚書本非歷史著作，春秋則起自東周。因此，我認爲用這些史料來論述我國史學的起源，也是理據不足的。

從太史公編寫史記時所用有關上古時代的資料來看，只有詩經、尚書、譜牒等幾種寫作於東周以上；其餘如世本、帝繫姓、五帝德等都是較晚時期的作品。在詩、書等早期作品中，詩經雖包含了一些歷史內容，有的篇章甚至可稱之爲史詩，可當作史料使用，事實上也是重要的史料，但就作品本身而論，畢竟還是文學作品，不是歷史著作。尚書是古代的官府檔案，雖接近於歷史著作，而就其作品的體裁考察，仍有些是有韻的便於傳誦的作品，和詩經的性質相類。如墨子·

非命下引泰誓曰：「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鑒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孟子·滕文公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左傳哀公六年載孔子引夏書曰：「唯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都是些文句比較整齊的韻文，和詩經的雅、頌並沒有什麼兩樣。而且，墨子·明鬼下所引大雅「文王在上，於昭於天，……」云云，就是詩經·大雅的文王之什，但他卻稱之爲周書·大雅，說明當時的詩經和尚書常被當作一書。所以墨子·非命中又出現了「夏商之詩書曰：……」的徵引法。更說明了兩書並沒有嚴格的區分。因此，我認爲早期的尚書，仍然只是文學作品，而不是歷史著作。太史公所用的早期作品中，只有譜牒可以說是具備了歷史著作的性質，但「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②形式還很簡單，內容也極粗略，這只能算是史學萌芽時期的作品。孟子說：「詩亡然後春秋作。」③只有這個接替詩、書而起的春秋出現之後，我國才算有了正式的歷史著作，而前此則是文學作品獨盛的時代。

但是，春秋之作爲歷史著作，卻並不始於孔子。漢書·藝文志說春秋起源於三古雖有問題，但它以記事之史皆可名春秋，則是正確的（但它以記言、記事來分判尚書、春秋則又是不足爲據的）。于省吾先生歲時起源初考謂我國古代一年只分春、秋二時，因而古人也稱年爲春秋，引申出來，記年之史也就名爲春秋。④我們認爲，這個說法是有理據的。但是，我們又認爲，春秋之

名最初雖是用於紀年之史，而在先秦時代，春秋之名絕不限於紀年之史，而為一般史著之通稱。同時，它雖為一般史著之通稱，而在不同的時期又有其不同的具體內容。這些具體內容的變化，正反映了先秦學術發展的不同階段。

春秋時代，除了孔子所作春秋而外，從各書中可考見者還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⑤ 國語·晉語載晉司馬侯對晉悼公說：「羊舌肸習於春秋。」這可能就是汲冢瑣語中的晉春秋。^⑥ 國語·楚語載楚申叔時對楚莊王說：「教之以春秋。」這當是楚之春秋。韓非子·備內有桃左春秋，隋書·李德林傳和史通·六家篇都載墨子說：「吾見百國春秋。」都說明春秋之名確為當時各國史著的一般名稱，各國各有自己的春秋。在這些春秋中，晉、魯、楚各國的春秋，其寫作時代都很清楚地在孔子之前。

先秦各國史著不僅稱為春秋，而且還稱為國語（或語）。李斯說：「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⑦ 諸侯所作的語，當然就是國語，「道古」的語，當然就是史著，就是國史。正說明國語是當時各國史著的通稱，並不專指左丘明所纂集者。汲冢書中有「國語三篇，言楚、晉事」，^⑧也正是左氏之外的國語。也正說明國語是各國史著的通稱。先秦各國史著既可通稱春秋，又可通稱國語，所以太史公既說：「左丘明……成左氏春秋」，^⑨又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⑩又說：「予觀春秋國語。」^⑪名目雖有不同，其實都只一書。如果細讀太史公原話，當更清楚。他說：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既是「具論其語」，無疑當是國語。既是「具論其語」而「成左氏春秋」，正好說明左氏春秋就是國語，國語就是左氏春秋。王隱《晉書·束皙傳載：「汲冢古書有春秋，似左傳。」^①是汲冢出土典籍，實有名爲春秋者，而唐修《晉書·束皙傳所載汲冢書目竟無名春秋者，而另有璅語十一篇。據史通·雜說上，璅語有晉春秋篇，而惑經篇又有璅語春秋一名。「璅」有連綴義、匯集義、璅語的意思，當也就是語的匯集，和國語的意思相同。所匯集之語既是春秋，也正說明國語就是春秋。韓非子·姦劫弑臣載：

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

這兩段文章的體例，和墨子·明鬼下所載周、燕、宋、齊等國的春秋是相同的，其爲春秋是無可懷疑的。這兩個故事與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所載齊崔杼事、昭公元年所載楚王子圍事相合，而文字上則有詳略不同。這種情況，正和現存國語和左傳的某些記載相似，事同而文異。當正是韓非子取之於國語（今本國語不全，已佚此文），而它卻稱之爲春秋，也正說明國語就是春秋。

用韓非子、墨子所引春秋之文以及國語來和孔子所修春秋比較，可以清楚看出，兩者的體例

是不相同的；雖然同是編年史，而一個是鋪敘式的，一個是綱目式的。但是，兩者在形式上雖有區別，而在內容上則又是緊密聯繫的。猶如司馬光資治通鑑與朱熹通鑑綱目，兩者是互為表裏的，不可分割的。只知孔經之為春秋，而不知國語之為春秋，便真是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禮記·坊記還載有兩段春秋引文：

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這兩段引文可能是公羊傳莊公七年所說的「不修春秋」，其體例全與孔經相同，是綱目式的。左傳宣公二年載董狐所書「趙盾弑其君」，也是綱目式的。這就說明，不僅春秋之書不始於孔子，即是這種綱目式的春秋也不始於孔子。

上面分析了春秋是先秦時代史著的一般名稱，又認為左氏春秋就是國語或春秋國語。但現存左傳、國語確為二書，對這個問題不能不略作說明。同時，為了便於下面對國語一書進行分析，先在這裏談談這個問題，也是有必要的。自劉逢祿以來，很多學者認為，左丘明所作實只國語，而非今左傳；在西漢以前，只有左氏春秋之名，而無春秋左氏傳之名。我們同意這一看法。這就說明左氏春秋只和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相類，而和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不同；是和孔子春秋沒有關係的。今左傳是漢人取國語改編而成。這一改編問題，早在東漢時期就已被王充揭露出來。他在論衡·案書篇中說：

左氏傳經，辭語尙略，故復選錄國語之文以實

作爲改編骨骼的有「傳經辭語」的左氏原著，應當就是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所載的左氏微二篇。左氏春秋（國語）和左氏微的關係，猶如漢書·藝文志所載儒家類的虞氏春秋與春秋類的虞氏微一樣，本是各自獨立的。

由於左傳是取國語改編而成，所以左傳的文辭較國語整潔優美，文風也較統一。因此，兩書只在文字上的差異較多，而所記史事則基本相同。但兩書既有分合，故在材料上也偶有詳略不同而有可以互相補充者。如自晉桓侯到晉襄公間的三軍將佐姓名，左傳所載非常完整，只僖公三十一年蒐於清原作五軍一事是例外，而晉語恰好保存了這項記錄，但又不記其餘各次。應當說，現存國語主要是保存左傳之未取部分，國語之所以能在編餘之後以「纂同異」^⑬爲外傳的名義和左傳並傳，也不是偶然的。

在明確了左傳是取國語改編而成的情況後，則國語之原爲國別編年史，當也就更清楚了。假如國語本不編年，是無法改編成爲編年體的左傳的。後世學者只見殘剩之今國語，甚至不顧今國語中還保存很多紀年的文字，而認爲國語源出尙書，是不編年的「記言」作品，顯然是不足憑信的。同時，在明確左傳是取國語改編而成之後，在分析國語一書時就有可能而且應當把左傳合在一起來考察了。我們認爲，國語（合今左傳）不是一部體系完整的作品，不是成於一時一地，而是匯集了當時各國的春秋（語）而成。所以書中各語在文章風格上不一致，起迄時間也各不同。

再就其內容考察，則更複雜。齊語僅記桓公時事，桓公以後的齊事則是附見於他國事中；再後的齊事，則是以晏嬰爲中心來記載。鄭語也但記桓公、莊公時事，桓、莊以後的鄭事，也是附見於他國事中；再後則是以子產爲中心來記載。晉語記事較詳而稍長，而其後期記載也顯然是以叔向爲中心。越語下，顯然以范蠡爲中心，與上篇大異。這些情況表明，各語之內也不是有系統的記載，也只是一些斷續記錄的匯集。當是有取於晏子、子產、叔向、范蠡等人之書。又左傳所載各項卜筮的預言，都非常準確，世人多疑其不實；汲冢書有「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¹⁴⁾則左傳中之卜筮，當又是取之師春。餘如左傳所載梓慎、裨竈的話，當也是取於梓慎、裨竈之書（也可能是漢人編左傳時所收入）。這樣看來，國語一書簡直有些像後世的叢書了。

上面，我們論證了先秦時代春秋是史著的通稱，國語也是春秋，又指出了當時各國都有自己的春秋。這反映出我國史學在這時有着普遍的發展；較之只有簡略的譜牒的時代大大前進了一步。但是，這一發展是從什麼開始的呢？我們準備在下面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孔子所作的春秋是起於魯隱公元年，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其他各國的春秋，也大致起於此時。孟子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¹⁵⁾他在這裏給我們揭示了春秋創始的相對年代。墨子·明鬼下爲了闡明「鬼神有之」的理論，曾徵引了不少史料來作說明，在這些史料的徵引中也從側面證明了孟子的揭示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墨子·明鬼下在引證「周宣王殺其臣杜伯」一事時說：「著在周之春秋」；在引證「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

一事時說：「著在燕之春秋」；在引證「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栢觀辜」一事時說：「著在宋之春秋」；在引證「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傲者」一事時說：「著在齊之春秋」。^{①⑥}周宣王在西周末葉，當公元前八二七——七八二年，早於孔子春秋約一〇〇年，其餘燕簡公在周敬王時，宋文公當周匡王、定王之際，齊莊公當周宣王、平王之間，都在周宣王之後，所引這幾國的春秋也都當在周宣王之後。而它在說明夏、商「鬼神之有」和文王死後爲鬼神時，却引證的是夏書·禹誓、商書和周書·大雅。墨子的這些引證，給我們暗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宣王以前的史事散見於詩、書（實際也是詩，說見前）之中，而宣王以後的史實卻記載於各國春秋之中。這正說明了春秋的記載是與詩相銜接的。這正與孟子所說「詩亡然後春秋作」以春秋繼詩經的說法相吻合。

我們再從詩經各國風的終止年代和各國春秋的開始年代來考察。

據毛詩所載詩序和鄭玄詩譜來看，商頌終於宋戴公，在周宣王、平王時；王風終於莊王；齊風終於襄公，當周桓王、莊王時；唐風終於晉獻公，鄭風終於文公，魯頌終於僖公，衛風終於文公，秦風終於康公，都在周惠王、襄王之際（前六七六——六一九年）；陳風最晚，終於靈公，在周定王時。^{①⑦}可見詩的一般終點都在公元前七、八世紀之際，也正是孔子春秋開始的時間。

國語中各語的開始年代，除吳語、越語因吳、越本較落後而時間較晚外，其餘各語也多開始於前七、八世紀。鄭語起自桓公，當周幽王時；晉語起自武公，當周桓王、僖王之際；齊語起自桓公，核以左傳亦同，當周僖王、襄王之間；左傳所載楚事，始於楚武王，詳而且多，楚語當是

始於武王，在周平王、桓王間。只周語較早，始於穆王，在宣王前百多年。⁽⁸⁾因周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起源較早是不足為奇的。由此可見，各國春秋（語）開始之時，正是詩經各國國風結束之時。孟子說的「詩亡然後春秋作」，正是說明國風變而為國語。這一變化反映了周代學術由文學的時代轉而入於史學的時代。

太史公說：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作春秋。」⁽⁹⁾孔子即曾到周都去搜集過纂寫春秋的史料，必然有所收穫，得百二十國寶書的說法。雖然不可信據，但他在修春秋時除了魯春秋外還盡可能參考了其他國家的春秋，當是無可懷疑的。但是，他所寫的春秋也只能開始於魯隱公元年——前七二二年，絕不是偶然的。應當正是由於各國史學在這時期才有了較普遍的發展，才開始積累了較廣泛的、較系統的可以依據的史料。史通·惑經說：「汲冢出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以上，難得而詳。」也正是有力地說明了這種情況。

我國史學在公元前七、八世紀有較普遍的發展一事，從史記所載各國國君在位年數的材料也可得到說明。

史記在周、秦本紀和諸侯世家中都載有部分國君在位年數，但各國開始記有年數的時間都不早。漢書·律歷志說：「春秋、殷歷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無年數。」作為當時政治、文化中心的周王室在西周中葉時都還沒有國君年數的記載，其他各國就更不用提了。由於西周中葉缺乏國君年數的記載，以致西周歷年的問題成為我國歷史上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的問題。西周天王開

始記年數的是周厲王，他在位三十七年，相當於前八七八——八四二年。其他各國開始有國君在位年數也大致與此同時或稍晚。

秦本紀載國君年數起於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當前八五七——八四八年。

魯世家自伯禽以下皆有年數，唯伯禽無年數。

齊世家記國君年數起於獻公，「九年，獻公卒。」當前八五九——八五一年。

燕世家記國君年數起於釐侯，「三十六年，釐侯卒。」當前八二六——七九一年。

蔡世家記國君年數始於夷侯，「二十八年，夷侯卒。」當前八三七——八一〇年。

陳世家記國君年數始於幽公，「二十三年，幽公卒。」當前八五三——八三一年。

杞世家言：「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以下都記有年數，但有脫誤。

衛世家記國君年數始於頃侯，「頃侯立十二年，卒。」當前八六六——八五五年。

宋世家記國君年數始於釐公，「二十八年，釐公卒。」當前八五八——八三一年。

晉世家記國君年數始於靖侯，「十八年，靖侯卒。」當前八五八——八四一年。

楚世家記國君年數始於熊勇，「熊勇十年卒。」當前八四七——八三八年。

鄭世家自前八〇六年桓公始封以下，皆有年數。

吳世家載國君年數自壽夢始，壽夢二年，晉使申公巫臣使吳，吳始通於中國。壽夢在位當前五八五——五六一。